

北宋龙泉窑纵论

沈岳明

郑建明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宋龙泉窑纵论

沈岳明

郑建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龙泉窑纵论 / 沈岳明, 郑建明主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10-5850-1

I. ①北… II. ①沈… ②郑… III. ①龙泉窑—瓷器 (考古)—北宋—文集 IV. ①K876.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75998号

北宋龙泉窑纵论

主 编: 沈岳明 郑建明

责任编辑: 谷艳雪 王 媛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校对: 崔 华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5850-1

定 价: 198.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目 录

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业	沈岳明 (1)
宋元时期福建北部的青瓷及其相关问题	栗建安 (15)
北宋晚期龙泉窑渊源略论	郑建明 (36)
北宋龙泉窑瓷器的发现与研究	谢西营 (65)
龙泉市博物馆馆藏北宋龙泉窑瓷器概述	周光贵 (82)
松阳县博物馆馆藏北宋龙泉窑瓷器概述	宋子军 王永球 (128)
庆元县廊桥博物馆馆藏北宋龙泉窑瓷器概述	吴魏魏 陈化成 (145)

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业

沈岳明

(复旦大学)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瓯江两岸不仅有充足的制瓷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龙泉窑早在晚唐时期即已开始瓷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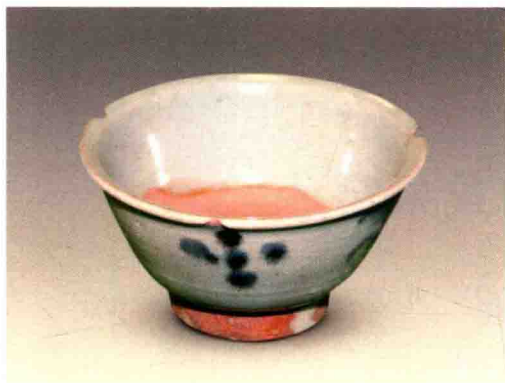
近年来，庆元黄坛窑址、龙泉金村窑址等都出土了一类饼足、施半釉、泥点垫烧的产品，具有唐代特征，但烧造规模不大，应属于龙泉窑的起步阶段。差不多同时，松阳的界首、青田的石帆等地也有窑址烧制青瓷，但生产规模都不大。主要器物有碗、杯、罐、瓶、盏、钵、盆、灯盏、砚等。胎质灰白、灰黑、灰褐。釉色以青灰、青褐色为主，少量施黑（褐）釉，部分器物口沿处加褐色点彩。至于丽水吕步坑窑址，其年代比黄坛和金村窑址要早，为唐代早期，但产品面貌与龙泉窑几乎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没有更多的联系，故不宜当作龙泉窑的初期产品。而五代时期的产品到底是何面貌？庄绰《鸡肋编》曾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的记载，是否可靠？

龙泉金沙塔塔基曾出土一件青瓷碗（图一），报告中描述为：撇口、浅腹、斜壁，圆饼形底，底心微内凹；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胎体粗糙，呈灰黄色；外底周缘有半圆形的泥垫支烧印痕5个，底中有墨书“塔”字。报告称该碗显然是建造塔基时人们有意识埋藏进去的，在夯土时被砸碎^[1]。从发表的器物图看，不管是器形还是装烧工艺，此碗与金村出土的饼足碗都完全一致，这既为塔基出土的墨书“塔”字碗找到了生产的窑场，也为窑址



图一 龙泉金沙塔塔基出土青瓷碗

[1]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年第4期。



图二 青花碗



图三 发掘出土的青花瓷片



图四 北宋中期淡青釉瓷器

出土的此类产品的年代提供了下限。

金沙塔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龙泉县志》中有记：“金沙塔，在金沙寺，七级皆可登。晋隋唐宋间名士多留题。”由于塔砖上发现过“太平兴国二年”的纪年文字，故发掘者认定此塔为北宋初吴越国尚存之时所建。但从县志所讲的隋唐时期题记看，金沙塔的建造年代似乎更早，据此推测该塔至少在“太平兴国二年”修过一次，所以出现有纪年铭砖。光绪《处州府志》载：“崇仁寺，县南五里，即金沙寺，五代时建，有华严塔。”可见文献中对金沙塔的建造年代也是有不同看法的。金沙塔因在塔基夯土中发掘出宋青花瓷而被世人关注，其实当时发掘出土的青花瓷与后来引发争议的那件青花碗本不是一回事（图二）。据发掘记录，出土的青花瓷为3件碗的口腹部残片，共13片，青花晕散（图三）。而那件相对完整的碗青花清晰，是在龙泉举办塔基出土文物展览并征集文物时群众上交的，后来被误以为是塔基出土的宋青花而广泛传布。此件青花碗的生产年代显然不可能到宋，故引起了大家的质疑。这里也予以澄清。至于出土的青花瓷片是否为宋代产品则需要深入探讨，如果“金沙塔，……晋隋唐宋间名士多留题”的记载无误的话，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器物年代似乎应比宋代更早。

龙泉窑唐代开始生产，经过五代、北宋早期的不断发展，至北宋中期已初具规模，且产品风格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其釉色既有别于传统的青瓷，更与典型的青白瓷不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我们一般称之为淡青釉瓷器（图四）。这种淡青釉瓷器，在1960年和1980年调查金村

窑址时被发现，其胎色比越窑浅淡，为浅灰白胎，胎质较细，器形规整端巧，胎壁厚薄均匀，底部旋修光滑，圈足高，施釉较薄，釉面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器表一般都有花纹，多运用类似北宋越窑的“划花”装饰手法，器底大多满釉。产品除碗、盘、壶、瓶、罐等日用品外，尚有专供随葬的明器多管瓶及长颈盘口壶等。金村窑址的淡青釉碗盘类器物绝大多数使用了垫圈支烧的方法，这与同期越窑相同，而与龙泉窑早期青瓷的面貌相去较远。从窑址以外的发现情况看，此类淡青釉产品基本出土在龙泉境内，数量不多。

在龙泉、庆元一带的宋墓中常常有淡青釉多管瓶、盘口瓶和执壶等成组出土。多管瓶制作精致，器形优美，直口、短颈、宽肩、圈足。黏接在肩部的管，有五管、六管、七管或十管的，以五管为主。管作花口，外壁削成多道直棱。龙泉市博物馆藏五管瓶（图五），通高42厘米。盖可分三层，上层捏塑出水荷叶状的纽座，荷叶中央为花蕾形盖顶；中层为半浮雕状覆莲瓣纹，莲角外翘，瓣面填以叶脉纹，蒂部呈池塘形，塘内堆塑四只鸳鸯作悠悠戏水状，其中两只嘴衔小鱼作吞食之态，翅有张有合，如扑如栖，体态逼真，生意盎然，富有浓厚的江南水乡风情；下层收作圆筒形，是为盖口。瓶直口，折肩，圆腹，圈足。肩腹之交堆贴褶皱状泥条按捺纹，形似水波。肩部均匀安荷茎五管，管修削成六面体，立式外斜微向内弯，管端呈齿状，与器口平行；管间饰如意云纹。上腹部饰半浮雕状五层覆莲瓣纹，瓣瓣起筋，瓣面填以叶脉纹；下腹部饰六条双线直棱，线间各饰一朵变形如意云纹，足外底施釉。可以看出，此时的龙泉窑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金村位于龙泉南部疏华山西麓，隶属小梅镇，与庆元县竹口镇上垟村接壤，距龙泉窑核心产区大窑仅五里路，并有古道与大窑相通。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陆容在介绍龙泉窑遗存的时候，除了大窑这个龙泉窑的核心产区，第二个就介绍了金村窑址，可见其重要地位。现在的金村窑场包括龙泉金村和庆元上垟两部分。金村窑址与上垟窑址尽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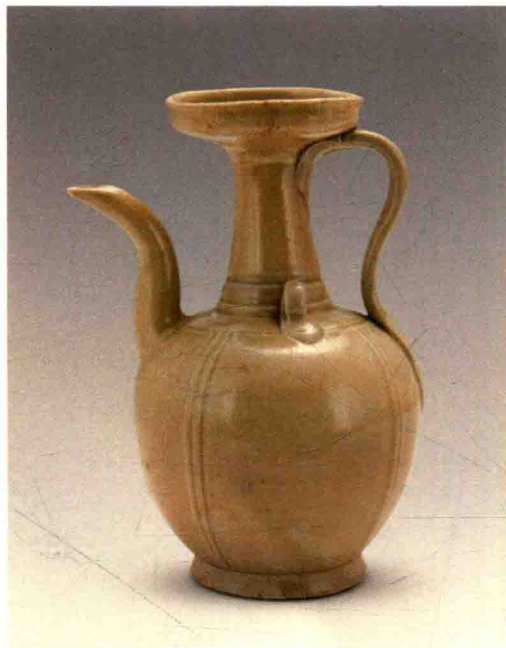
图五 龙泉市博物馆藏五管瓶

归不同的行政区域，但窑场连成一片，主要分布在瓯江上游梅溪两岸，北起金村东北的角岩山，南至庆元县竹口镇上垟的垟淤店自然村，东至金村下坑（涧），西达上垟村大饭会。1934年，陈万里先生调查金村时发现少数窑址。1960年，考古学者选择金村第16号窑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瓷器，同时还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发现窑址十多处。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这一区域共有窑址52处，均为宋元时期的古窑业遗址，如屋后山、溪东、大窑彝等，基本处于瓯江上游两岸，溪边还发现了古代运输码头遗迹。

从调查发掘情况看，龙泉窑的早期窑场基本都分布在这个区域。如前述淡青釉瓷器，大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烧制过的迹象，溪口也仅见南宋、元代的产品，而龙泉东区的早期产品主要是北宋晚期的双面刻划花产品，比淡青釉产品要迟。

在金村窑址中还发现了淡青釉瓷器与前文提及的饼足器物同烧的现象。淡青釉瓷器基本都是垫圈支烧，到晚期出现泥饼垫烧工艺，不见金沙塔基出土饼足碗的泥点支烧工艺，且淡青釉瓷器多见圈足、不见饼足。所以，尽管饼足碗等器物与淡青釉产品在同一个窑中出现，但两者年代上的差异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对这类窑址（主要在金村）未进行科学发掘，两者之间的变化发展情况尚不清楚。究竟是饼足、泥点支烧工艺在龙泉地区出现了滞后现象，还是这种工艺在龙泉地区延续了很长时间，抑或是垫圈工艺在龙泉地区的超前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在金村窑淡青釉产品中，数量比较多的要数执壶（图六）。这些执壶样式丰富，



有喇叭口式、盘口式、孟口式等，壶腹多用双竖条等分，并装饰疏朗纤细的划花纹，有些还贴饰捏塑的鸳鸯等为耳。以造型而言，喇叭口式执壶明显无盖，盘口式、孟口式则应有壶盖相配，且这两类执壶的肩部通常置有小系。

盘口瓶多为浅盘口、细长颈、深腹，肩腹部刻划缠枝牡丹、花卉、莲瓣和竖条纹等。龙泉市博物馆藏有盘口双系长颈盖瓶（图七），通高40.5厘米。与前述五管瓶相应，其盖也捏塑呈池塘形，为出水荷叶状纽座和花蕾形盖顶。瓶盘口，长颈，折肩，圆腹，圈足。肩颈处堆贴对称双系，肩部饰两朵对称的如意云纹。肩腹相交处和上腹部各堆贴一周

图六 金村窑执壶

褶皱状泥条按捺纹，形似水波；腹部光素无纹，足外底施釉。

从淡青釉产品中常见的执壶、盘口瓶及五管瓶来看，其造型风格均与同时期越窑产品类似。如淡青釉盘口瓶，腹部装饰多重莲瓣，与北宋中期越窑流行多重莲瓣装饰相同（图八）；而执壶腹部的双竖条分隔，也与越窑北宋中期流行的屏风式布局一致^[1]（图九）。从器物的装烧工艺看，淡青釉产品采用的也是越窑北宋时期主流的垫圈支烧。所以从总体面貌看，淡青釉产品除釉色与越窑的青釉有所差异外，不论是器形，还是装饰艺术，甚至最能体现窑业技术传承的装烧工艺，均具有强烈的越窑风格，故有学者将这种瓷器称为越窑瓷器的“龙泉类型”，或龙泉窑瓷器的“越窑类型”。不过两者只是风格类似，故不宜对龙泉淡青釉瓷器做过多的定性。

越窑晚唐五代兴盛，北宋早期进一步发展，北宋晚期处于低谷，除了上林湖这一核心区域，在上虞窑寺前、宁波



图七 龙泉市博物馆藏盘口双系长颈盖瓶



图八 北宋中期越窑多重莲瓣装饰



图九 越窑北宋中期屏风式布局装饰

[1] 即将器物腹部四等分，各部分由两道凸棱间隔，每一部分一般有一些简单的装饰，从器物腹部展开图看像是竖立着的四块屏风。



图一〇 东钱湖窑址刻划花装饰

东钱湖、黄岩沙埠等地也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窑场，但这几个窑场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窑寺前窑场相对是最早的，基本处于北宋早期、吴越国尚存的时间段。而东钱湖窑场年代略晚，基本处于北宋中期，尤其盛行刻划花。近几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东钱湖上水窑场，其刻划花工艺大有超越上林湖中心窑场的趋势，有一些产品与上林湖刻“官样”款器物从造型到装饰几乎一致（图一〇），是否也是宫廷下样制作的产品

值得研究。黄岩沙埠窑场时间最晚，主要生产于北宋晚期，有一些产品甚至已经跨入南宋。从几个窑场的盛行时间看，有越窑中心窑场逐渐从北向南转移的趋势，而龙泉窑场自北宋晚期开始慢慢走向兴盛的情况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从现有资料看，淡青釉产品的风格与越窑产品相类似，其生产年代大致处于北宋中期，也许最早能到北宋早期，但情况不甚清楚。至于有人直接把此类淡青釉产品的年代划为五代，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臆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其能到五代的任何证据。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的天圣年间（1023 ~ 1031 年）淡青釉碗被认作是龙泉窑早期产品，其器形为敞口、斜弧腹、圈足，釉为淡青色，口沿内部有弦纹一周，内底心由细线划出纹饰，内壁刻“天圣”等六字。从胎釉特征、制作工艺来看，其与金村窑址淡青釉类产品相似。温州市西郭大桥头出土一件铭文碑（图一一），其胎骨呈淡灰色，胎质坚硬细致，瓷面釉色较浅，碑铭正面刻“开宝三年太



图一一 温州市西郭大桥头出土铭文碑

岁庚午……”^[1]。该铭文碑的胎釉特征与淡青釉有相似之处，时代为北宋开宝三年（970年），但是否是龙泉生产却很难说，故淡青釉产品是否在北宋初期就有生产尚需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淡青釉产品大致流行在北宋中期（不排除上下略有浮动），产品风格受到越窑，甚至瓯窑和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影响，可能还受到青白瓷产品的影响，生产区域处于闽、浙、赣交界处。龙泉是由浙江入江西、福建的主要通道，素有“瓯婺八闽通衢”“驿马要道，商旅咽喉”之称，历来为浙、闽、赣毗邻地区商贸重镇。江西、福建是烧造青白瓷产品最兴盛的地方，浙江境内温州地区的泰顺、文成，衢州地区的江山，杭州地区的临安等受周边影响，都曾在某一个时期内烧造过青白瓷，故淡青釉产品风格，特别是装饰艺术受到青白瓷的影响，或者说两者相互影响，都是正常的。烧造这类淡青釉产品的窑址目前仅在龙泉金村一带发现，产品也主要在龙泉及其附近发现，其他遗址中出土的数量较少。这些器物除了反映出当时的制瓷水准，也反映了当地的葬俗文化，地方特色浓厚，地域性较强，说明当时处于小规模就地烧造销售阶段。这也说明龙泉青瓷正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从唐五代到北宋早中期，龙泉窑尽管不断地寻求自身发展，但囿于地处高山峻岭之中，总是不温不火，发现的窑址也是零零星星，未形成规模。由于瓯江航道险滩多，水流急，每年都有几百条船被撞沉或倾覆，处州郡守关景辉于元祐七年（1092年）发动各县利用农闲时间疏浚瓯江，去害兴利。龙泉知县邱括率先集资治滩，百姓捐资踊跃，各县纷纷仿效。宋代龚原的《治滩记》记载：“毕合百六十有五滩，龙泉居其半，缙云亦五分之一。凡昔所难，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2]瓯江的治理大大改善了交通运输的条件，龙泉窑产品随着瓯江顺流而下，运输到温州等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再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运输渠道的通畅、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使龙泉窑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开始大规模扩张。到北宋晚期，龙泉窑业突飞猛进，窑址已达百余处，除了金村，大窑、溪口、龙泉东区等区域都有生产。这一时期的瓷器厚胎薄釉，胎体明显增厚，胎色灰白，质地与前期的淡青釉产品相比反而显得不够致密。底部厚重，圈足宽矮而挖足极浅，制作不如前期规则工整，轻巧不足，凝重有余，这是否是“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的真实反映？产品种类颇显单调，一般窑场均以各式碗类器皿为大宗，盘类次之，主要产品有碗、盘、壶、炉、罐、瓶、碟和盅等。器物造型有了很多变化，碗类产品坯体厚薄较为均匀，口沿以外撇为主，圈足相对显小；盘类产品腹部多做成凸出的转折状，有假圈足。器物普遍流行刻划花装饰。从装烧工艺看也与淡青釉产品有很大的不同：淡青釉类器物主要是垫圈支烧，

[1] 徐定永：《温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质碑铭》，《考古》1965年第3期。

[2]（宋）龚原：《治滩记》，（清）苏遇龙重修《乾隆龙泉县志》卷十二《艺文志》，龙泉市博物馆藏乾隆刊本。



图一二 北宋晚期龙泉窑器物标本

到后期出现黏土垫饼填烧^[1]现象，而此时的产品几乎都采用黏土垫饼填烧，且底足内不施釉。（图一二）

从金村的窑址调查中可以看到，刻划花瓷器叠压在淡青釉瓷器堆积层上，如早年在金村大树岭和上垟大窑彝等窑址都有这种现象。刻划花瓷器应该是在淡青釉瓷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胎质上看，胎釉颜色明显加深；从装饰上看，普遍流行繁密的刻划花，与淡青釉瓷器流行划花装饰明显不同。从窑址出土的碗、盘类器物看，多数为双面刻划花，再辅以篦纹、锥刺纹。外壁饰折扇纹，内壁主要饰花卉纹，图案浑圆，布局对称，在同一平面上往往有主纹、地纹之分。装饰题材以折扇纹、团花、篦纹为主，并有少量荷花、荷叶、缠枝菊花、牡丹、蕉叶纹、水波纹、莲瓣等。纹饰繁密，稍晚还出现了外壁刻莲瓣的装饰。而一些窑址中发现的内壁印菊花、外壁刻直线纹的产品^[2]与耀州窑刻划花产品风格非常相似，甚至经常有人将两者混同，由此可见龙泉窑广泛吸收各地青瓷名窑的制作工艺和技术以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这应该也是北宋以后龙泉窑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当然，龙泉窑的刻划花青瓷与耀州窑还是有区别的，它不似耀州窑那样粗犷，而显得精细密布，小巧流畅，刻花手法也有所不同。

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产品的销售区域大大扩展，不仅在龙泉周边地区，在全国各地也发现不少这一时期的龙泉窑产品。如江苏溧阳竹箬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李彬夫妇墓出土的青瓷碗、松阳县“辛未”纪年墓出土的龙泉青瓷、四川阆中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陈安祖夫人墓出土的盘以及浙江温州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白象塔清理出的佛像等，都是这一时期龙泉窑产品的代表。

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李彬夫妇墓之墓主李彬，为“资积巨万”的地方富豪，墓中除了龙泉青瓷，还出土了一批以银包镶边口的景德镇窑的上等影青瓷器及各种神像、佛像、七宝香炉、琉璃建筑等。出土的青瓷碗口外敞，内里饰荷花加篦点纹，外腹饰典型的折扇纹，圈足内无釉，黏土垫饼填烧。这种双面刻划花风格应该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前后就已出现，到李彬的元祐时期（1086～1094年）已经比

[1] “垫饼填烧”专指垫饼垫于圈足的垫烧方法，以区别于垫于圈足下的“垫饼垫烧”。

[2] 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

较成熟。(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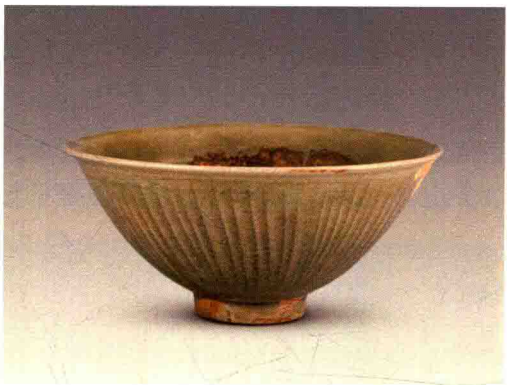
2003年,在浙江省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工业园建设工地的一座古代墓葬中出土了24件瓷器和2件漆器,其中有龙泉窑青瓷8件。龙泉窑青釉刻花碗2件(图一四):圆唇,侈口,口沿外撇,深弧腹,圈足。碗心饰团菊纹,内腹刻划菊花纹,外腹口沿下饰一周弦纹,其下饰折扇纹,底部饰两周弦纹。灰白胎,青釉,全器施满釉,外底部露胎无釉。与元祐六年李彬夫妇墓中出土的龙泉青瓷碗一致。龙泉窑青釉刻划花盘3件:圆唇,敞口,浅弧腹,圈足。内底和内腹基本饰团菊纹,外腹口沿下饰一周弦纹。灰胎,青釉,全器施满釉,圈足内露胎无釉。龙泉窑青釉刻划花执壶1件(图一五):尖唇,敞口,喇叭形长颈,圆肩,鼓腹,凹底,肩部有曲流、曲柄和对称的双系。外腹呈瓜棱状,饰缠枝菊花纹。灰白胎,胎质细腻,釉色青翠,全器施满釉,外底部露胎无釉。总体风格与越窑北宋中期产品有相似之处。由同出的湖田窑影青碟外底“辛未”墨书,及漆器上“丁巳”“癸酉”纪年,综合判断其“辛未”应为1091年,与李彬夫妇墓年代相同,从中也可看出,折扇纹这种装饰流行了不短的一段时间。

浙江武义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五管瓶,肩、腹部作塑贴花边装饰,展现了北宋晚期龙泉青瓷器形与装饰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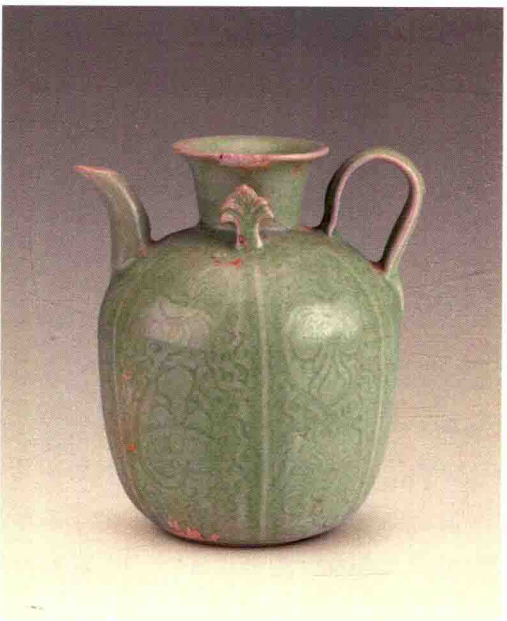
陈安祖为北宋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之后,陈氏家族在当时极为显赫。



图一三 双面刻划花青瓷碗



图一四 龙泉窑青釉刻花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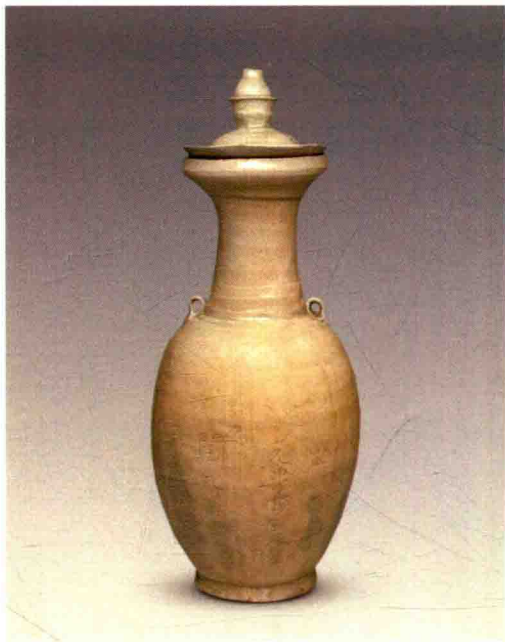
图一五 龙泉窑青釉刻划花执壶

陈安祖夫人墓中出土有龙泉青瓷盘。

20 世纪 60 年代，温州市白象塔出土的北宋菩萨造像，从底部垫烧方法、施釉工艺到制作风格都与北宋龙泉窑相似。菩萨结宝顶髻，头戴庄严冠，面相慈悲，额饰白毫，缯带飘垂肩旁，臂有宝钏，胸配璎珞，左肩斜披络腋，衣饰华美，游戏坐姿，圆台形须弥座，座上立一鸽子。从菩萨的装扮到坐姿等，尤其是右腿曲蹲、左腿盘坐的休憩坐姿，一改佛教造像直立或打坐的成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几成观自在菩萨即水月观音的经典姿势，是北宋的流行样式。

大维德基金会藏有“元丰三年”（1080 年）铭盘口瓶（图一六），腹部题刻“粮塘承，贮千万年香酒归去，伯年归后，荫翳千子万孙，永招富贵，长命大吉，受福无量，天下太平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圆日，愿烧上色”^{〔1〕}，大致说明了此类瓶型的用途和象征意义。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收藏的青瓷多嘴罍（铭文中有“元丰三年又九月十五圆日”），与大维德基金会盘口瓶一样，均烧制于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日。从这两件瓷器的铭文对闰九月的不同称法看，它们可能分属两个窑场的制品，至少铭文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由此可以窥见龙泉窑在北宋晚期的元丰年间已初具规模。

此外，也有人经常把龙泉出土的盖内墨书“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的五管瓶作为北宋时期的典型器（图一七）。但在笔者看来，这件“庚戌”年器物定为南



图一六 大维德基金会藏“元丰三年”铭盘口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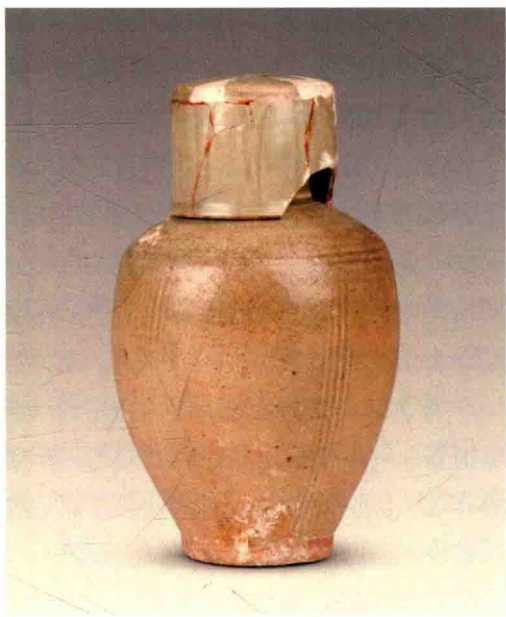


图一七 龙泉出土北宋五管瓶

〔1〕（英）霍吉淑：《道破玄机：英国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铭款瓷》，《美成在久》2015 年第 1 期。

宋要更恰当一些。该五管瓶高 29.2 厘米，覆盘式盖，盖纽呈重叠罐状，盖顶呈穹隆状，下缘翘起，圆唇，子口较高，顶饰折扇纹；瓶直口，微敛，方唇，溜肩，弧鼓腹，矮圈足外撇，腹分五级，由下而上逐级内收至口部，肩部有 5 个圆柱状管，上腹饰折扇纹，下腹饰仰莲纹，通体饰黄绿釉，灰白胎。其盖内墨书“庚戌”，学者们推测应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 年），但是我们从瓶下腹部莲瓣内的篦纹情况看，其年代似乎不应该这么早。我们知道，越窑南宋早期的器物非常流行莲瓣加篦纹的装饰，北宋晚期则未见。而从该五管瓶底部看，其圈足内没有施釉，很明显是因为采用泥饼填烧工艺而不能在外底施釉。从丽水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何偶墓出土的梅瓶子看（图一八），其莲瓣加篦纹的装饰与“庚戌”年五管瓶上的完全一致，而出现年代已经到了 1178 年，与 1070 年要相差 100 年，其流行时间似乎长了些。此外，何偶墓梅瓶的装烧工艺采用的也是泥饼填烧法。当然，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与其实际生产的年代会有时间差，但作为普通的器物，

这个时间差不会太长。另外，从前几年出土的有“绍熙五年”（1194 年）刻款的残碗看（图一九），其外腹的装饰是同样的莲瓣加篦纹装饰，装烧工艺也是泥饼填烧。如果将“庚戌”年五管瓶与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元丰三年”（1080 年）五管瓶比较，可以看到两者腹部的莲瓣装饰是不同的，一个是莲瓣加篦纹，一个是复线莲瓣；管的形状也不同，一个是内收的，一个是外斜的。尽管文华馆藏五管瓶仅有器身，没有盖子，但从同时期其他五管瓶的形状看，凡是五管外斜的，其盖子均为套住罐口，而五管内收的，盖子都有子口，其方式是不同的。而“庚戌”瓶的盖子恰恰是有子口的，所以与文华馆藏“元丰三年”五管瓶差别较大。种种迹象表明，“庚戌”年五管瓶的年代没有熙宁三年这么早，可以推后 60 年，即定为 1130 年更为合适。



图一八 丽水何偶墓出土梅瓶



图一九 “绍熙五年”刻款瓷片

北宋晚期的“龙泉县窑”似乎是在短期内陡然兴起的，当时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此类青瓷除用于国内销售外还大量用于外销，在沉船及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中也经常出土，其中以日本和东南亚为多。

通过上述资料可知，这类普遍采用刻划花装饰的青瓷在北宋中晚期一直烧造，加之元祐七年（1092年）的瓯江治理工程使龙泉及其相连水路得以真正开通，“凡昔多难，尽成安流”^[1]，故出土这类产品的遗址范围并不局限于龙泉及周边县市，在江苏、四川等地也有出土。可见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发展壮大，开始占领部分青瓷市场，其产品在北宋晚期已经进入外销市场，也让龙泉窑产品进贡朝廷成为可能。

关于北宋晚期时龙泉窑产品是否已经进入宫廷，叶真的《坦斋笔衡》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2]有学者根据《坦斋笔衡》中这条关于窑业的记载，认为北宋时期的龙泉窑质量很粗，与宫廷用品存在很大差距。从我们前边对北宋晚期龙泉窑刻划花产品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龙泉窑产品总体面貌是胎比较粗厚，制作似乎也不如早期之淡青釉产品。但我们也看到，叶真在文中与龙泉窑做比较的都是非同一般的窑场，无论是“不堪用”的定窑，还是“命造青器”的汝窑，或者是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官窑，都与宫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即这几个窑场在当时都为宫廷烧造瓷器。也就是说，北宋末期的龙泉窑与定窑、汝窑、官窑等的地位是一致的，其已经进入皇家的视野，在为宫廷烧造瓷器了。龙泉窑在此时已然成为江南青瓷的代表，这与越窑最后一次进贡“秘色瓷”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的记载^[3]是吻合的。北宋后期，越窑因各种原因而逐渐衰颓，南方制瓷业中心向龙泉转移，龙泉窑在大规模烧造粗厚产品的基础上烧造部分宫廷用品也是顺理成章的。《坦斋笔衡》中讲到龙泉窑质颇粗厚，重点可能更多体现在厚上，这个厚是相对北方地区的定窑、汝窑而言，与南方瓷土含铝量低有关，一直到南宋时期，由于紫金土的掺入，瓷土含铝量提高才使器物的胎变薄成为可能。

另外，宋人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4]人们往往因为“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的记载而怀疑此书的真实性。前文已经提到，由于至今没有对吴越国时期的龙泉窑生产情况进行更多的工

[1]（清）顾国诏、张世植：《光绪龙泉县志》，中华书局，1957年。

[2]（宋）叶真：《坦斋笔衡》，（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津逮秘书本。

[3]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四、茜绯纱一十四、秘色瓷器五十事。”

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57年。

[4]（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

作，虽然在金村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唐代风格的饼足泥点支烧碗与圈足垫圈支烧的淡青釉产品共出的情况，但是否经历五代吴越国却并不清楚，而秘色瓷是越窑的特色产品，许多文献也都提到越窑在吴越国时期大量烧造秘色瓷并用于进贡，所以对《鸡肋编》的记载有所怀疑也是正常的。

庄绰一生历经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过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豫章位于今龙泉市兰巨乡，在唐代江南东道括州的版图上，龙泉境内山的地理标志仅有一座豫章山，北宋《元丰九域志》卷五“望龙泉”条记有“州西南三百五十五里五乡高亭一银场有豫章山龙泉湖”，亦只提到豫章山。这可能与唐宋之时龙泉豫章山因出铜而著有关，龙泉县“地名豫章”正是当时豫章闻名的反映。“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庄绰在谈到“钱氏所贡”时用了一个“盖”字，“盖”即大概如此，说明其并不肯定，故其记载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如果把《鸡肋编》与《坦斋笔衡》结合起来考虑，两书记载的龙泉窑北宋晚期与宫廷的联系在时间上符合，内容上也一致，而且还明确指出了这种供货的性质是“制样须索”。至于为什么庄绰在书中提到“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可能与吴越国时期的法师德韶有关。天台德韶（891～972年）是五代时期禅宗法眼宗僧人，也是龙泉人，而且是龙泉历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与吴越钱氏关系甚密。他十五岁出家，十八岁受戒，后在天台山传法，吴越钱俶当时在台州作刺史，曾延请问道。钱俶继承王位后，遣使迎请，尊德韶为国师，开堂说法。从德韶法师与吴越国王的亲密关系看，如果此时龙泉窑真的能烧造出优质青瓷的话，作为贡品是很有可能，但是从现有调查发掘资料看，尚未有龙泉在吴越国时期就烧造质量很高的青瓷的线索。至于说龙泉窑烧造秘色瓷，倒大可不必纠结于此，因为到宋代以后，秘色瓷成了高档优质青瓷的代名词，无论是耀州窑，还是汝窑、龙泉窑、官窑，甚至高丽青瓷，都打着秘色的名号。至于“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从近几年龙泉窑的调查发掘情况看，理论上也是讲得通的。但这种“制样须索”产品到底是怎样的风格，我们并不清楚。

在北宋晚期龙泉窑中，除了常见的繁缛的刻划花产品外，有一类产品做工考究，色泽淡雅，装饰相对简单，题材基本都是仙道之类（图二〇），或与仙道有关，似乎与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



图二〇 仙道题材装饰